

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评述



西昌学院“质量工程”资助出版系列专著

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 及作品评述

RIBEN JINXIANDAI ZHUMING ZUOJIA
JI ZUOPIN PINGSHU

陶 箭 著

陶
箭
著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前言

“日本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整理 20 世纪世界文学遗产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它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学交汇点上创造了自己 20 世纪的历史辉煌，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珍贵的精品，在走向现代化、日本化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整理它的遗产具有独特的意义。”^①

在日本文学史上，一般认为自明治维新（1868 年）至大正（1912 年 7 月 30 日—1926 年 12 月 24 日）结束的这段时期的文学为“近代文学”，而昭和（1926 年 12 月 25 日—1989 年 1 月 7 日）以后的文学为“现代文学”。

本书经过多次梳理，精挑细选了日本文坛上较有成就和影响的 29 位作家，其中有的堪称世界一流作家，其代表作品很多早已译介到我国，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本书在选择作家的标准上考虑了以下几个要素：思想深刻，代表性强，影响范围广，获奖情况以及作者个人爱好等。他们中既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也有享有盛名的作家，如村上春树、渡边淳一、小林多喜二、志贺直哉、石川达三、太宰治等，甚至还有 21 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朝吹真理子等。另外，笔者还特意选取了反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名著文学的代表作家，如井上靖、芥川龙之介等。本书对他们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轨迹、个性特征、代表作品进行了逐一评述，让读者对日本近现代作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本专著对作品的评析从笔者本人的视角出发，带有个人见解和认知，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日本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对日本当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本书正是笔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成果，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日本近现代小说乃至日本近现代文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更希望本书能带给读者一些心灵的感动。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学术期刊和国内外各种相关资料，也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因篇幅所限在书中没能一一列

^① 叶渭渠，唐月梅：20 世纪日本文学史 [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出，在此，谨向有关的专家、学者、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歉意和敬意。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真诚地敬请各位同行和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另外，西昌学院“百书出版工程”项目、西昌学院科技处和四川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立项和出版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并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陶 箭

2013 年 6 月



总 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略部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于2007年1月正式启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2007年2月，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自此，中国高等教育拉开了“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序幕，从扩大规模正式向“适当控制招生增长的幅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转变。这是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重大工程。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西昌学院在“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导、注重特色的原则，推行“本科学历（学位）+职业技能素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把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视为学校的永恒主题。学校先后实施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十四大举措”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20条”，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7年的努力，学校“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建成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省级特色专业，2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2个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专业，3个省级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建设项目，16门省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省级实践教学建设项目，1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4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

为搭建“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交流和展示的良好平台，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取得明显实效，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健康成长，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整体水平，学校决定借建院十周年之机，利用



2013 年的“质量工程建设资金”资助实施“百书工程”，即出版优秀教材 80 本，优秀专著 40 本。“百书工程”原则上支持和鼓励学校副高级职称的在职教学和科研人员，以及成果极为突出的中级职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版具有本土化、特色化、实用性、创新性的专著，结合“本科学历（学位）+职业技能素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成果，编写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类的教材。

在“百书工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申报：一大批青年教师更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和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一批教授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各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院学术委员会等部门的同志在选题、审稿、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为实施“百书工程”付出艰辛劳动的广大教师、相关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同志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能为提升西昌学院整体办学实力增光添彩，更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代表学校教学科研实力和水平的佳作源源不断地问世，殷切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西昌学院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西昌学院校长 夏明忠

2013 年 6 月

目 录

“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森鸥外	(1)
“见鬼去吧!” 二叶亭四迷	(5)
“爱情教科书” 作家尾崎红叶	(10)
“国民大作家” 夏目漱石	(15)
“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 岛崎藤村	(28)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拓者” 樋口一叶	(36)
“观念小说” 作家泉镜花	(42)
“小说之神” 志贺直哉	(51)
“恶魔主义者” 谷崎润一郎	(56)
最有影响的新思潮派作家山本有三	(62)
日本文学界的鬼才芥川龙之介	(66)
童话作家、诗人宫泽贤治	(75)
“原爆文学的代表” 井伏鱒二	(80)
“新感觉派” 作家川端康成	(87)
“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 小林多喜二	(94)
“时代的批评家” 石川达三	(105)
日本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家井上靖	(109)
“无赖派(新戏作派)旗手” 太宰治	(121)
农民作家深泽七郎	(129)
缠绵病榻的作家三浦绫子	(133)
现实主义批评家山崎丰子	(139)
“当代日本先锋文学作家” 安部公房	(144)
“争议颇多的作家” 三岛由纪夫	(150)
“情爱大师” 渡边淳一	(162)
“存在主义作家” 大江健三郎	(168)



“日本的福克纳”中上健次	(187)
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旗手村上春树	(192)
“透明族”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村上龙	(201)
“潜力无限的女作家”朝吹真理子	(208)
参考文献	(211)



“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

森鸥外 [もりおうがい] (1862—1922)，原名森林太郎，号鸥外。近代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江戸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教育。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学校，曾任陆军军医。1884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1888年森鸥外留学归来，以启蒙家的姿态开始文学活动。他翻译西方著名作家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同时创办《栅草纸》等文学刊物，介绍西方美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并致力于戏剧改良、诗歌革新活动。其早期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后期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往往采取冷峻客观、富于哲理的笔调，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高濂舟》《舞女》《泡沫记》《信使》《青年》《雁》《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涩江抽斋》等。



“20世纪前半叶三巨匠”（叶渭渠，唐月梅，2010：139）之一的森鸥外是位“弃医从文”的作家。“反自然主义的三派鼎立时代”的日本包括了三大文学流派，它们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余裕派，以森鸥外代表的浪漫派，以及以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叶渭渠，唐月梅，2010：79）。

日本评论家认为，森鸥外的作品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场景描写逼真。他的作品有取材于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青年》（1910）、《雁》（1910）等，历史题材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阿部一家》《高濂舟》（“脱离历史”的历史小说）等和人物传记《涩江抽斋》等。

1890年发表的处女作《舞女》，连同森鸥外的《泡沫记》和《信使》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舞女》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德国的日本青年官吏，追求个性解放和纯洁的爱情，他曾爱上一个德国穷舞女，但在日本专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压力下，最终遗弃了

她，酿成爱情悲剧。作品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最终却与现实妥协。一般认为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1910年前后，森鸥外写了《青年》《雁》等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雁》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小说发生在明治年间，一个贫苦的少女沦为高利贷主的情妇；她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暗自爱上一个每天从门前经过的大学生，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表白爱情的机会，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作者怀着同情写出一个普通妇女的不幸，但却把这种不幸归结为偶然性的恶作剧，最后用一只碰巧被飞石击毙的雁来象征她的命运。

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森鸥外开始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分为“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两类。前者完全依据史料写作，后者则借助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作家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赞美了武士殉死行为；但紧接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短篇小说《阿部一家》却客观地抨击了这一封建道德行为。阿部一家由于未被允许为藩主殉死而受到歧视，终致满门被杀戮。小说揭露了封建殉死制度的虚伪、腐朽和惨无人道的实质。这两篇倾向不同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

短篇小说《高濂舟》属于作者所谓“脱离历史”的历史小说。作品描写一个犯人在囚船上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自刎未死，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因而被判罪流放。他认为囚徒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该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

森鸥外晚年埋头于史料的考证，也写过几部人物传记，如《涩江抽斋》等。所传人物多为专心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总之，森鸥外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明治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

二

森鸥外的短篇小说《高濂舟》(1916)首先表现了“杀人犯”喜助“善”的一面。被高濂舟押解送往海岛流放的喜助犯的是杀弟之罪，喜助虽然身板瘦弱，可是他说自己很健康，脏活重活都能承担下来，就是为了赚点钱弥补生计。他在囚船上讲述了自己的杀人经历：喜助杀人的动机是“因为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自刎未死，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因此被判罪流放。其实，这类似现在的“安乐死情节”问题，而作家故意选择了日本封建幕府末期社会底层民众生活贫苦的惨状作为“安乐死情节”的材料。因为喜助的弟弟实在痛苦，想彻底解脱，他主动向喜助请求杀了自己，而喜助只是做了善事，帮助弟弟

脱离了苦海！世上难得兄弟手足情，事实上也是如此：兄弟二人在京都做着低贱的苦役，其辛苦所得左手进右手出，甚至入不敷出，只得腆颜举债，而兄弟俩由始至终不离不弃。后来弟弟患病，喜助更是拼命做工，好让他得到治疗，快速痊愈。然而弟弟十分惭愧，深觉无法偿还哥哥喜助的艰辛付出，于是割脖自杀。但弟弟戏剧性地自杀未遂，只得恳求喜助帮他继续苟活下去的苦难中解脱。哥哥喜助拔出刀刃，划断了可怜弟弟的余脉，终于让弟弟达成愿望离去。

其次是“杀人犯”喜助“恶”的一面。喜助杀死自己亲弟弟的过程被邻居老太太进屋撞见，于是喜助自然而然地因“杀弟”的行为遭到逮捕，随后身陷囹圄。在老太与外人的眼光中，喜助是“杀人犯”，是“恶”的代表。但这种“安乐死情节”的“恶”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矛盾体，如果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答案也是不同的。同船押解喜助的衙役庄兵卫听了喜助的叙述感到迷惑不已，他说：“这究竟算得上杀害弟弟么？这就是所谓的杀人么？”弟弟已经对喜助说，就算喜助不拔刀，他也非死不可，他忍受不了痛苦，想要快些死掉。喜助看着弟弟痛苦的样子于心不忍，为了将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才杀了他。正如喜助弟弟的恳求：“拔掉剃刀大概就能死了，帮我拔掉吧。”但是衙役庄兵卫也认为，说喜助帮弟弟拔掉剃刀是害了他、杀了他也不错。这是犯罪么？杀人犯罪，这点毫无疑问。但若是为了解除痛苦而杀人，这能算是犯罪么？庄兵卫心生疑问。

而喜助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获罪。庄兵卫一样找不到喜助应该获罪的理由，为此只能将其交由权威者、当权者去判断。庄兵卫“决定将奉行大人的判断当作是自己的判断”，但就算这样，庄兵卫心里依旧不能释怀，觉得“要是能当面问问奉行大人就好了”。

第三，《高濂舟》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人的处境——日本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喜助和弟弟二人在京都做着非常低贱的苦役，而且收入连基本的正常生存状态都难以维持，更严重的是疾病也相伴发生。穷困和疾病交加，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努力赚钱也是徒劳的，因为社会环境就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作为弱势者的弟弟感悟到了这一切，他不愿意看到爱他的哥哥如此徒劳地为他拼命打工，并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好，于是割脖自杀。他自杀未遂，只得恳求喜助帮他继续苟活下去的苦难中解脱。可怜的喜助别无选择，便拔出刀刃，划断了弟弟的余脉，让他满意离去，帮助他实现了得以彻底解脱的“安乐死”。

在监牢里，喜助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光是这点，我就感到非常对不住衙门了”。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也无法治好弟弟；但被当成犯人，关在监牢里，喜助却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现实竟然如此荒诞！甚至出狱后被押解流放海岛，衙门又给他发了两百文钱，喜助说道：“如果今后还有饭吃，那就能省下这两百文钱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怀里揣着自己的钱



呢。等到了岛上，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活干，但我打算把这两百文当作本钱来用。”相比以前的食不果腹，现在却可以不劳而获地吃到一日三餐，最后还领到二百文钱，这怎么不会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快乐的喜助并不以即将流放为忧。喜助竟然认为当囚徒或者被流放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的荒谬与黑暗。

森鸥外留德时期因为学医的原因，较早接触到西方科技与文明，对安乐死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有所了解，他对安乐死始终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本着良心执着揭露封建幕府末期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惨状的森鸥外，不得不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国家变革、思想封闭、文化管制的复杂局面而将自己以史明志的小说家身份抽离到无情的现实中来，这才导致他在晚年只能埋首专研史料考证和人物传记编撰，而忍痛丢下深爱的小说创作事业。这在侧面上反映了森鸥外愤懑沉郁的心绪和想要冲破凡俗、置身方外的无奈。喜助这一“杀人犯”的“善”与“恶”，社会荒谬与个人的处境，构建了一篇让人产生思辨、富有强韧的道义和伦理性的动人杰作。

“见鬼去吧!” 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 [ふたばていしめい] (1864—1909),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 [はせがわたつのすけ], 笔名二叶亭四迷, 近代日本作家,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在古日语中的隐喻为: 见鬼去吧! 「くたばってしめ(ま)え」(又译: 你给我死掉算了! / 你最好死了算了! / 生不如死!)。二叶亭四迷 1864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江户市谷 (今东京都), 父亲是地方的下级武士, 明治维新后成为小官吏。1878 年 5 月, 就读于森川塾 (私立学校), 10 月退校。1880 年 2 月到 4 月再度在森川塾就读。自 1878 年起三年间三次报考陆军士官学校, 均未被录取。1886 年 1 月, 自东京商业学校退学, 拜访坪内逍遙。同年 4 月, 发表《小说总论》; 次年, 一部实践其文学理论的长篇小说《浮云》连续刊载, 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 当过官报局的翻译、编辑, 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师, 还出任过清朝北京警务学堂官员。1888 年至 1908 年, 二叶亭四迷翻译介绍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 他的译文忠实于原作, 言文一致, 颇受好评。1904 至 1905 年前后, 二叶亭四迷任大阪《朝日新闻》驻东京特派记者, 在报社同仁鼓动下, 恢复了文学创作。1908 年, 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被派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后因肺结核加剧, 5 月 10 日, 回国途中客死于孟加拉湾, 葬于新加坡。主要作品有《浮云》《小说总论》《其面影》《平凡》等。



二叶亭四迷之所以选择这个笔名, 据说是因为不懂文学的父亲对他搞文学不满曾这样骂过他, 另外也有自嘲的意思, 还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鄙夷。

二叶亭四迷启蒙于汉学, 深谙儒家思想。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明治维新的“开化革新”的氛围中度过的。他从小接受汉学教育, 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把为人正直、“俯仰无愧于天地”当作座右铭。当时沙皇俄国向亚洲扩张, 引起日本朝野的愤慨。他在爱国激情的支配下, 曾多次报考陆军士官学校, 却未被录取。1881 年 5 月, 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科肄业。这一时期, 他阅读了 19 世纪

俄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受到俄国文学的熏陶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这对他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遂选择了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

二叶亭四迷于1886年（明治十九年）发表评论集《小说总论》，在《中央学术杂志》刊行。《小说总论》补正了作家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不周之处，系统阐述了小说应通过现象“反映本质”，从而成为认识真理的工具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批判了仅仅注重形式上的“深刻描写”的所谓写实论和流于肤浅低俗的游戏文学，发出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的先声。

二叶亭四迷于1887年发表实践这一文学理论的长篇小说《浮云》，首创言文一致体（白话文）。《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共由三编组成。因为当时作者还是无名文学青年，所以第一、第二编是以坪内逍遥的名义发表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四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果我们把阿政的功利主义看作是封建时代的旧思想的代表，那么，本田就是一个貌似具有新思想、实为地道的旧思想的卫道士，而阿势正是游弋在这几者之间的一朵浮云。作品通过明治初期的一个小人物文三丢了工作、失去恋人，其小小的愿望被无情粉碎后成为社会上“多余人”的遭遇，反映了明治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苦恼，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批判了当时社会中单纯模仿西方社会的种种浅薄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日本文学界高度评价了这部名垂于文学史的现实主义杰作。

中村光夫等人在编写的《近代日本文学史》中评价道：“《浮云》的文体采用日本最早出现的清新的言文一致体，并熟练地运用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写实地描写了近代社会及其人物。”（中村光夫，1947）

《浮云》（1887）给其后日本文学的创作和近代文学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从而使二叶亭四迷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和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二叶亭四迷还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并写有日记、回忆录和杂文等。日本评论家认为：“二叶亭四迷是一个不幸的文人，为了找到男子汉的毕生事业，他一直在文学与政治、艺术与实践这个本质问题上苦恼、彷徨。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又是一个毕生肩负日本近代史命运的伟大作家。”（中村光夫，1947）

《浮云》讲述了一个正直的青年被录用为政府的下级官吏，本想克己奉公，奉养老母，和意中人结合，保住个人幸福，结果却受到排挤，丢了官职，意中人也被人夺走。小说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也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肤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主人公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情人鄙弃的命运，披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和人情的淡薄，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的“多余人”形象，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小说问世时却反响不大。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成立议会，颁布《教育敕语》。

来自下层的民主自由运动，在明治专制政权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二叶亭四迷认为“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于是他停止了小说的创作。此后，他当过官报局的翻译、编辑，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师，还当过清朝北京警务学堂官员。20年中，二叶亭四迷翻译介绍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日俄战争后，他发表长篇小说《其面影》《平凡》，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亦颇有影响。他曾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后刊有《二叶亭四迷全集》9卷。他的译文忠实于原作，言文一致，颇受好评。二叶亭四迷也作为高水平的翻译家名垂文学史，其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幽会》《邂逅》两部作品在明治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04至1905年前后，二叶亭四迷任大阪《朝日新闻》驻东京特派记者。20世纪初，搁笔达20年之久的二叶亭四迷为高涨的自然主义思潮所感染，在报社同仁鼓动下，重新握笔创作，于1906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其面影》。这部小说描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入赘某家为婿，和妻子感情不和，却与守寡回家的妻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为家庭和社会所不容，他抛下情人和家庭到中国流浪，最后变成穷途潦倒的酒鬼。小说对封建势力进行揭发控诉，并对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判。190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平凡》，他故意模仿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平凡人的一生。这个人从小受到家庭的溺爱，青年时和一个富家的女儿相爱，经历了人生难忘的初恋。以后写了一两部应时的作品，博得一点小名气，并和公寓的女佣人厮混。最后他决心放弃过去的生活，老老实实娶妻，生子，奉母送终，了此平凡的一生。作品夹叙夹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状况进行冷嘲热讽。二叶亭四迷的最后一部作品《平凡》已经失去了《浮云》里那种追求积极人生的热情，丧失了那种逼人的气势，明显地流露出了作者的悲观和绝望。《平凡》写成后，他再度搁笔，于1908年赴俄国又彼得堡任《朝日新闻》特派记者，1909年病死于回国途中，葬于新加坡。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巩长金、石坚白等译的《二叶亭四迷小说集》。

二叶亭四迷主要的三部小说《浮云》《其面影》《平凡》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对现实不满、遭到社会恶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软弱无力，缺乏斗争勇气，最后对人生感到幻灭，是特定的日本半封建社会下的“多余人”的典型。作品通过对这些“多余人”的描写，对明治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另外，二叶亭四迷在开创言文一致、清新流畅的文体上也有一定的功绩。

二

二叶亭四迷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浮云》的叙事背景是日本江户后期。明治维新开始，旧臣陆续被革职和闲置，主人公内海文三就是一个闲置大臣的儿子。14岁时，他的父亲郁郁而终，留下了每日饥肠辘辘的孤儿寡母。无奈之下，

母亲只得将其送给叔父寄养，此后他在叔父园田孙兵卫家里生活了六七年。内海文三大学毕业后做了一个小官员，后被裁员。作品围绕内海文三的人生坎坷，细腻刻画主人公由被人认可至被人讨厌最后被边缘化的矛盾形象典型，反映了明治初期日本小知识分子的苦恼，揭露了明治时代的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即使在今天，《浮云》仍然有学术探讨的意义和价值。小说围绕被边缘化的典型矛盾形象叙事。首先是曾经被人认可的内海文三：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有正当工作，在政府单位当个小官吏，条件不错。他出生在静冈县的旧武士家庭，14岁告别了乡下的老母，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寄宿在叔父园田孙兵卫家里六七年。文三的叔父经常外出经商，家里只有园田孙兵卫的后妻阿政和两个孩子（一个是美女堂妹阿势，另外一个是在读寄宿学校的堂弟）。看到内海文三当了官员，婶婶觉得文三颇有出息，意将比文三小五岁的女儿阿势许给文三。阿势长得很俊俏，自幼是母亲的掌上明珠，长大后成了一个娇纵任性的姑娘。她受到当时所谓的“文明开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接受了明治初期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教育，洋气十足，看上去学艺兼优。文三爱上了阿势，但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明自己的爱慕之心，心情很抑郁。阿势准备许身于堂哥内海文三，而她母亲阿政也表态同意。内海文三是位性格比较单纯、正直的青年，没有什么野心。他本想克己奉公，奉养老母，和意中人结合，保住个人幸福，小日子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内海文三的工作和生活照此下去没有发生突变，可能他就如愿以偿了；但是作者安排了一场让人始料不及的突变。这样的突变改变了内海文三的命运，在这之前他被人认可的形象突然分崩离析，彻底坍塌，还引发了一系列让他备感纠结、痛苦、迷茫的变故，他终于认识到社会生存的竞争残酷性和人性的势利、功利与无情。接下来是被人讨厌的内海文三：两年后，当内海文三正在憧憬着与美丽、可爱的堂妹阿势结婚时，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他身上——在所谓“机关进行行政改革”时，生来不擅溜须拍马、巴结上司的文三被解雇了！也许有人说，再找个工作不就得了？但作家设定的是那个时期找工作很困难，几乎没有可能性。以前被他人认可的内海文三现在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内海文三。以前尊敬他的人现在露出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婶婶和堂妹得知内海文三被裁员，她们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文三被免职的第二天，婶婶口出污言骂了文三，以后经常指桑骂槐。阿势虽然当时为文三辩护了几句，但很快和文三的同僚本田升亲热起来。善于溜须拍马和善于追求女人的同事本田升也日日造访叔父家，和堂妹打情骂俏，夺取她的爱恋。本田升是老于世故、擅于蝇营狗苟的人，行政改革中非但没被免职，反倒官升一级当上了科长。一天，本田邀请阿政一家去团子坂观菊，阿势居然欣然前往，这使文三苦恼万分。这以后，本田与阿政母女来往日益亲密，对文三则竭尽嘲弄。阿势劝文三去求本田为其复职出一臂之力，然而，文三根本不愿与只知对上级献媚求宠的庸俗之辈本田一谈。为此，文三和阿势发生了争吵，他

觉得自己在园田家已经无法住下去，便决定对堂妹进行一次忠告，然后坚决离开她家。婶婶阿政准备将内海文三赶出家门，内海文三自己也觉得没必要生活在这里，他先和同事本田升绝交，然后去质问堂妹是不是真心喜欢本田升，堂妹阿势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内海文三的意识中，他认为堂妹阿势在四者之间像一片浮云一样飘忽不定，是势利之徒，靠着天生的小聪明，实际上却很浅薄，是水性杨花的市井妇人；认为婶婶阿政是极端功利的市井妇人，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势利小人；而趁火打劫的同事本田升不过是善于溜须拍马、极尽所能献媚讨好领导的哈巴狗而已。内海文三尝到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现实，最后不得不颓丧地搬离了叔父家。不久之后，本田升升职了，随后便和阿势结婚了。

《浮云》似乎提出这样一个悖论：善于溜须拍马讨好上司的本田升具有“很适应生存发展”的能力，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升官发财，还得到美女；而“正直、正派”、不会讨好上司的内海文三却被撵出单位，被美女抛弃，甚至被撵出借住的场所。作者二叶亭四迷展示的现实社会是多么荒谬啊，而人性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被权利、金钱、利益异化了！

最后是被边缘化的内海文三：内海文三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意中人鄙弃的命运，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黑暗和人情淡薄的炎凉世态，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浮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四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并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的“多余人”形象。如果我们把阿政的功利主义看作是封建时代的旧思想的代表，那么，本田就是一个貌似具有新思想、实为地道的旧思想的卫道士，而阿势正是游弋在这几者之间的一朵浮云。被边缘化的内海文三则代表了当时日本小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不幸，反映了明治初期他们的纠结和苦闷。正如中村光夫所说：“《浮云》文体采用日本最早出现的清新的言文一致体，并熟练地运用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写实性地描写了近代社会及其人物。”（中村光夫，1947）《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不为过的。